

改革会风文风 才能离民众更近

继友谊医院、朝阳医院后，同仁、天坛、积水潭三家北京医院统一取消药价加成，全部药品按进价销售；取消延续多年的3元、5元、7元、14元挂号费和诊疗费，增设医事服务费。按照医生职级不同，从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到知名专家，医事服务费分别为42元、60元、80元和100元。

医药分开 回归医院的服务角色

推行医事服务费，旨在切断医生与医院药品收入间的利益关系，是医疗付费方式的配套改革之一，也是医药分开的重要改革支点，若能以此实现医院收入模式的变更，对遏制大处方、过度用药、滥用检查等弊弊，无疑有积极意义。

支撑医事服务费的原则，是医生应该以提供诊疗服务实现收入所得，比如诊断、开方、手术、治疗等，医院则在医疗服务的供给中获利。换言之，医生与医院，是某种专业性服务性活动的提供者，而非其他。但在现实中，随着以药养医体制的建立，医院药房融为一体，药品销售费用成了医院在医疗收费和财政投入之外的重要收入源。医院在提供医疗服务的同时兼卖药品，既是药品使用的信息指导方，也是药品提供方，这给过度医疗埋下了隐患。

医院药房与社会药店还是有所区分，这个区分在于，国家为医院药品销售制定了15%的加成上限。但对医院而言，药品收入形成了一种无形压力，这种压力经过层层加码，直接对应到了具体的科室、具体的医生，成为医生用药的无形指标，医生往往通过多开药、开高价药，将这种压力转移给患者；另一方面，对于医生个人，因为手握处方权，医生能够决定用什么药不用什么药，因而在不同药品的制造、销售商那里，处方权具备了变现的可能，由此衍生出医疗回扣问题。医院创收和医疗回扣，成为患者承担的成本，融入了药品的终端价格之中。

可以看出，医药不分的医疗体制，直接导致了医院职能和医生职业定位上的扭曲，看病费用的高企，首先是从医疗服务与药品销售的捆绑开始的。因此，我们谈医药分开，核心自然应该是医与药这两种职能的分业，对于医院，药房收入与医院收入脱钩；对于医生，开具处方与销售药品分离。原有的药品收入由医院和医生间共享，医院对药品销售依赖的削弱，将直接作用到药价上，进而缓解看病贵问题。而且，医生收入所得，也实现了按服务能力、资质、等级来分配，对于鼓励医生向上攀登，也有着激励作用。

不过，也要看到，医事服务费行之有效，前提是药费、挂号费和诊疗费在折换成医事服务费之后，治疗的总费用是下降了。对于患者利益而言，这是个加法，但对于医院收入而言，这是个减法，在公立医院普遍负债运行的基础上，这个缺口收入靠什么填补，又是个问题。另一方面，医院按进价售药，意味着取消了药品加成，但药房与医院又没有彻底分开，医院和医生还是有可能将药品进销价格的决定权变现。

以药养医的根子，在于医院投资和运作体制，也在于本该独立的药房被纳入了整个医院之中，因而，推行医事服务费，还远远谈不上真正的医药分离，很多深层问题，它自然也无法解决。不过，对于医药分开而言，医事服务费所指向的改革方向毋庸置疑——医院不是卖药的商业机构，医生也不是以处方权变相兜售药品的商人，医院和医生的定位，只能是专业性的医疗服务的提供者。熊志

媒体日前报道，杭州警方联手淘宝网破获了全国首例“恶意差评师”案，7名“差评师”被逮捕，警方表示打击行动将持续进行。

“淘宝文化” 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就性质而言，首例“恶意差评师”案其实是敲诈勒索类案件，并不足以成为舆论焦点。只是作为电子商务的代表性网站、亚太最大的网络零售商圈，淘宝的每一点动向都有为电子商务“立规矩”的意思。市场法则是否已在电子商务领域确立？传统法条对网络违法的适用性如何？这些都是本案的看点。

淘宝几乎覆盖了中国绝大部分网购人群，这一人群也成为其次生文化的创造者与参与者。小到以“亲”开头的淘宝体的流行，大到第三方支付系统的普及，以消费者评价为核心的信用评级体系的建立，淘宝不仅展示了消费社会的斑斓图景，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消费社会的发育。当然，它和其他社交网站一样，培育了新的网络社群，改变了传统的交往方式。

作为一个市场，淘宝文化带着某种侠义和江湖气。它天无二日，海不扬波，当然也泥沙俱下，鱼龙混杂。这之中，信用评价体系是一个可资观察的亮点。以买家的“好评”、“中评”、“差评”（现在还有更细致的打分）来决定销售者的信用级别，并直接影响其利润、信誉和品牌，这种体系直接决定了淘宝的基本秩序，并塑造了它的主流文化。在购买前先看卖家的信用评价是每一个买家的习惯，而珍惜评价和努力提升信誉等级也是每一个卖家盈利的基本条件。传统市场中难以贯彻的信用评价体系，在电子商务领域获得了一个简洁的廓形。

要想自己获益，须给别人创造利益，这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伦理，其建立有赖于信用体系的成熟。淘宝对其“评价文化”非常珍视，针对卖家的不诚信比如刷信誉和买家的不诚信如恶意差评，都开展过内部维权。在公安机关介入之前，淘宝已就“恶意差评”问题开通了恶拍举报绿色通道，对监控到的和卖家举报的群体恶拍订单，经核实后进行关闭交易处理。“评价文化”的建立和维护，给传统市场带来很多启发，其精神甚至可以为医改和教改所借鉴。

法律的适用范围并不区分现实和虚拟，但用现有法律解决网络新案件是对司法和执法的考验。这种探索需要一个一个具体案例提供台阶和支点，逐渐建立网络市场的法治秩序，使法律手段在虚拟世界的运用更娴熟。作为电子商务文化的衍生品，首例“恶意差评师”案充当了这样的台阶，成为将网络市场行为带入法治框架的探索。明光

一些官员张口是官话、套话，各种会议形式主义等不良习气，屡屡引起民众反感，既不爱听，也不爱看，正是这些细节，让官员和民众之间生分、产生距离感，导致社会话语系统的分裂。

自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亮相以来，会风、文风的悄然改变，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11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媒体见面会上作了一番干练、亲民、务实的发言。此后，李克强副总理在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打断官员发言，要求不要念稿，并频频即兴提问。而最近，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廉政反腐座谈会上，打断了专家“尊敬的王书记”的发言，要求少说客套话，少用讲话稿。

三位领导人不约而同地在会风、文风上打破惯例，令人感觉耳目一新。会风、文风问题，如今是造成官民隔阂的重要因素，一些官员张口是官话、套话，各种会议搞形式主义等不良习气，屡屡引起民众的反感，既不爱听，也不爱看，正是这些细节，让官员和民众之间生分、产生了距离感，导致社会话语系统的分裂。

当下，大家都谈共识，都在寻求共识，可是，如果有些官员还是满嘴官话、套话，怎么让民众感觉和他有共识？又怎能让民众感觉，与之打交道的政府部门真是为自己的利益着想？

政府所有的权力都来自人民，官员理应与民众说着一样的话，用民众喜欢的文风表达。这个事情虽小，属于细枝末节的问题，但就是这样的细节，能够给民众留下最为直观的印象。

很多时候，民众对具体政府部门、官员的评价，都是感性的，直接打印象分。所以，继续深化改革这样的宏大命题，也需要从小事做起。因为，就是在会风、文风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当中，民众直观感受到了执政者理念的改变。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告诫全党，“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如何避免空谈，那么，最容易做的就是改革会风、文风，将会议上和文件中的那些客套和空话去掉，直面问题，这样才会让民众

看到实干的精神。政治的运作，是规则之治，有制度有规则，才能营造平等、高效有活力的会议气氛，让不良会风无处藏身。之所以当下很多会议令人难耐，很大程度上在于不知道“如何开会”。哪些该议不该议，会议的议程如何设置，正需要地方和部门去解决、改变。

在座谈会上，王岐山专门提到转变作风要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要切实改进文风会风。改变会风、文风，也正需要各级官员们的身体力行。

习近平总书记此前强调，“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力气解决。全党必须警醒起来。”不良会风，无疑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一大表现，改革会风文风不是件小事。要进一步扩大和巩固社会共识，官员和民众不能生活在两个话语系统当中。以会风文风之变拉近官民距离，三位领导人开了个好头，接下来，公众期待，这种会风文风的改革能通过细节的改变，让政坛风气为之焕然一新。国维

令人惶恐的“蝗虫说”



15岁的“非沪籍”生占海特，为了争取异地高考权利，网上约辩沪籍青年，结果被斥“上海不需外地蝗虫”。把同胞斥为蝗虫，确实够损的。从这一人格侮辱事件看，不难理解异地高考推进的艰难。

“蝗虫说”令人惶恐。一个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外来人口的贡献，这一点儿成共识。我们没有什么理由只要求别人贡献，而不与别人分享发展成果。

一些人为什么要抵制异地高考，道理很简单，他们怕异地高考政策一旦放开，本地的优质教育资源被稀释，使本地考生面临更激烈的竞争。这是典型的地方保护，是特权思想在作怪。

这一特权是高考分省指标造就的。分省指标是一存在好几十年来的体制，它给北京、上海等地有别于其他地方“政策红利”，这些地方家长和考生习惯将此当作自己的一种权利。拥有这种权利，他们觉得理所当然。事实上，这种权利的存在本身就不合理、不公平、不公正，在“保护”一部分考生的同时，“牺牲”了另外一部分考生的利益需求和正当权利。这

种显失公平的“特权”，只会制造社会不公。多年来，打破户籍壁垒，实现“无障碍”的异地高考呼声不断。今年国务院终于有了明确态度，要求各地年底前拿出相关方案。放开制度才能让每个孩子得到公平的机会，虽然这一天来得有点迟，但总归让人们看到了一点进步。文/薛建国 图/王成喜

“作家”富豪榜 切莫亵渎作家之名

一年一度的作家排行榜总会引起热议。当莫言说750万元的诺贝尔奖金不够他在北京买房的时候，作家的地位在许多人心中又低了一层。在这个以金钱衡量价值的社会里，很多时候，肥头大耳，穿金戴银的暴发户，会比作家们赢得更多的尊重和羡慕，商业巨贾们的一掷一镒也总会引领一代青年奋发不息。

作家富豪榜以另外一种形式给“作家”这个稍显落寞的群体吸引到了一点关注，在一定程度上，还给他们赢得了“尊敬”。说不定，这个榜单还会引领一批青年走上写作之路，但对更多的人来说，关注这个榜单跟关注商业富豪排行榜、娱乐圈明星排行榜没什么大的区别，主要功能是博得闲人茶余饭后一笑。

可制作这个榜单的人据说可是用了心的。制作方“历时半年”调查了各位作家的版税情况，据此给作家排名，还要请他们走红地毯。

光荣上榜的“作家”们作何感想？不知道彼时踏上红地毯，聚焦于闪光灯下的他们会否有一种扬眉吐气、挥斥方遒之感？

我看了看排行榜前30位的作家，据我推测，其中有一部分“作家”，如果会踏上这个红地毯的话，应该不会有什么上述感觉。比如排名第30位的陈坤，我以前只知道他是个明星，若不看这个榜单，还不知道他有“作家”这个身份。走红地毯对他来说应该是家常便

饭，不在乎多走或者少走这一次。孤陋寡闻的我对这份榜单上的大多数“作家”都没久仰过。

我还以为诸如王蒙、贾平凹、余华这些对我来说如雷贯耳的名字会上榜，但是榜单上的名字却让中文系毕业的我，感觉自己已经落在当代文学发展潮流之后了。

现在的情况是，是不是在某本出版物上署个自己的名字就能晋升为“作家”？我不知道制作方是如何调查到这些“作家”的版税收入的，又是经过何种计算方法得出这个结果的。窃以为，如果仅以版税收入为衡量标准，这个榜单可以名之为“出书人版税收入排行榜”。不过细想之下，还是觉得不妥，因为我知道的作家，比如余华，比如莫言，他们的作品有多种文字行于国外，制作方历时半年的调查中，是否也将国外发行版税囊括其中？

也许制作方有着严谨和求实的精神，已经考虑周全，但他们又是跟跟这些“作家”核实过，毕竟全国人民如

此关注，容不得忽视。制作方称，中国作家富豪榜是持续追踪记录中国作家财富变化，反映中国全民阅读潮流走向的著名文化品牌，态度不可谓不认真。

市场经济下，各行各业都需与市场挂钩，无可厚非。榜单制作方为了文化市场的繁荣竭尽心力，高明地发明了以金钱来衡量一个作家价值这样具体、量化、普通人能一看就懂的指标，将“作家”们从幕后推向前台，为他们赚足眼球，赢得关注，既推广了文化，又娱乐了大众，可谓用心良苦。

有了这么严肃认真的态度，还需要具备足够的专业知识，既然是“作家富豪排行榜”，首先应该厘清作家与“出书人”的区别，作家本已经是个可怜群体了，别把这个群体更弄得鱼龙混杂，那些光芒四射的人被归入这个群体，不仅作家们怕是不受得起，那些人说不定也不乐意。再者，用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作家是贫是富，金钱是不是唯一，也得问问读者们同意不同意，作家认可不认可。毕竟我们的文明还有个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区分。最后，标准有了，制作者需继续用心良苦，认真负责，执行中别出漏洞才好。

总之，精神领域的产品需小心为妙，切莫打着市场的旗号亵渎作家的称号。邓崎凡

11月25日清晨，西安出租车司机赵师傅开车撞了路灯杆，司机表示，车辆仅仅是前保险杠撞变形了，路灯杆几乎完好无损。报案后，西安市市政公用局城市照明管理处开出了9660元的赔偿标准。但据记者了解，一套路灯按市场价算下来不足1000元，并且赔偿中竟然包括2000元罚款，更让人难以理解。(12月3日中国广播网)

撞路灯遭天价索赔 是权利碰瓷

在西安市城市照明管理处开出的赔偿中包括“一套灯具2600元，附件700元，单件材料上浮费用660元，事故勘察车600元，工程车800元，吊车800元，人工费500元，市政道路占用办证1000元，罚款2000元，共计9660元”等9项。

笔者认为，西安市城市照明管理处的高额索赔标准涉嫌“敲诈勒索”。据事件的采访记者咨询本省、外省多家生产路灯的企业，对方均这样表示，如果用最好的并且是国家专利材质价格在500元。其次附件灯泡、整流器、触发器、电容等一些配件用好的也就400元。一套路灯按市场价算下来不足1000元，这都算是比较好的路灯了。“按设置管理科算的，一套双臂路灯的价格就高达3960元，一个城市光安装路灯的钱就轻轻松松上亿了。这又不是金子做的。”就此，有网友感叹道，官方碰瓷，就是比地痞还赖有水平。

西安市城市照明管理处的做法完全是违法的。按照《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司机赵师傅应对撞损的路灯杆及灯具予以修复，使其恢复原样，而无法恢复原样的，应照价赔偿。但是，西安市城市照明管理处不仅高价索赔，还处以2000元罚款，这是绝对不允许的。赵师傅有权要求管理处改正赔偿标准和违法处罚，也可以向上级主管部门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还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民事诉讼，以维护个人的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害。

西安市城市照明管理处的做法暴露出了权力的傲慢。首先他们在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丢失的路灯和赵师傅驾车撞击灯杆有关的前提下，便主观断定已丢失的路灯就是赵师傅撞落的。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城市照明管理处设置管理科彭科长称：“他把这事放在网上，而且又叫来了媒体。这个事情对我们照明管理处影响特别不好，现在不处理他这个事情，先放着。想处理可以，等这件事情平息了再说，而且就按标准赔，一分不少。”这种权力的傲慢表明，赵师傅不仅要承受高额赔偿，还要承担车辆暂扣而带来的潜在经济损失。出租车是赵师傅的生活来源，现在车辆被交警暂扣，问题解决不了，赵师傅就提不出车，也就等于断了家庭经济收入，还要向停车场交纳一笔不菲的车辆保管费。城市照明管理处“现在不处理他这个事情，先放着”，这一招儿比高额索赔更阴损、更毒辣。

损害东西，照价赔偿，这是天经地义的。但其中关键在“照价”二字。现在社会信息愈发透明，物品价格很容易查到，很难做手脚的。西安市城市照明管理处自以为大权在握，就持权压人，狮子大开口，把标准算到骨子里，这与马路边专门搞碰瓷的地痞还赖又有什么区别？徐云鹏

近日，网络盛传一份民工工资表，内容显示民工日工资220元，最高日工资是队长的350元。这份工资表引发网友热议。(12月2日《潇湘晨报》)

“农民工工资表” 不值得羡慕

一份“民工工资表”，令众多非民工群体“花容失色”。用诸多白领的话说，这一对比，敢情自己真心才是最底层的。羡慕当然是没有道理：对比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1年平均工资主要数据来看，就算是最好的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薪资(年平均工资42452元)，以“民工工资表”观之，两千三的月薪比收入较低的“抹灰工”还要相差一大截。

但这样的“工资表”，显然已不是传说。稍有装修经验的都知道，眼下的“工价”确实要远超历史的想象。然而，这样的工资水平真的“逆天”了吗？一者，市场经济的基本逻辑就是供求决定价格，“现在的年轻人大多不愿从事装修工作”，加之“每年都有一批年老的装修师傅退休”，在装修的“刚需”面前，泥水师傅已是供不应求，工价高又何奇之有？二者，“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已成为自上而下的共识，应该说，当下的民工工资在人口红利后理性回归，并不能说其薪资水平“高”了，只不过在初次分配中还原了其劳动价值的本来面目罢了。

网上的艳羡之语溢于言表，但说穿了，羡慕的不过是薪资数字，而绝非生存语境。这就譬如城里人热爱的乡村游，说起来个个无限神往田园牧歌式的“原生态”，水村山郭、刀耕火种，但真要让其置身其间、安享此般“业态”，恐怕唯恐避之不及了。对“民工工资表”的艳羡，所说的不过是叶公好龙，所想的不过是唱给老板听的一声娇嗔。

道理并不复杂：一方面，稍有生活常识的都知道，泥水匠做的活儿，别说200元一天，就算翻番上涨，几成人能吃得那份苦、受得了那份累、耐得了面子上的泥灰？另一方面，纸面上的数字薪资固然可观，但讨薪秀年年大尺度上演，背井离乡后，最终要拿到这些看似美好的薪资，个中酸楚，非常人能懂。

民工兄弟的这份辛苦钱，分分厘厘都是体力与技术所得，是劳动价值，更是血汗补偿。只有切实改善其工作环境与权益处境，我们的艳羡才会穿越表面化的薪资，回归职业的尊重与敬仰——而距离这个目标，起码目前还很遥远。邓海建